



● 闽南传统聚落和营造技艺的文化地理背景

杨莽华 中国艺术研究院

【内容摘要】“红砖文化区”是对分布红砖人居群落为景观形态确定的文化区域，即闽南文化区的一种称谓。闽南地区背山面海，闽越时期封闭偏僻的边陲，历经晋朝士族南渡之后多次大规模移民，不同族群聚居繁衍，建祠立庙，敬祖怀乡；直至沉淀出一支恪守华夏传统又被赋予了海洋文化气质的民系；还演化出建筑风格独特的聚落文化景观。宋元泉州海外交通贸易进入鼎盛，异域宗教和文化融入；明清的海外移民风潮使闽南再次领受西方文化，这些因素使得闽南传统建筑无论是建造技艺、装饰手法还是群落布局都更多地凝聚了多元文化的印记。从文化生态、文化源流、文化区域和景观形态的视角探究闽南聚落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价值体现，可以为闽南文化生态区的可持续发展理清思路。

【关键词】闽南文化地理；交通与航海；移民与民系；聚落；营造

闽南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区域，其文化生态和历史积淀有很强的独特性。闽南的传统人居聚落是最别致的人文景观之一，有非常完备的营建规则、技艺体系、管理制度、传承秩序和美学取向。以泉州为中心南北到漳州、莆田至今还分布着许多红砖红瓦的民居组群。圆月弯刀般夸张起翘的燕尾脊，出砖入石砌筑的山墙，艳丽的油饰彩绘以及交趾陶、水车堵、剪粘等建筑装饰在灰砖灰瓦为主基调的中国古民居家族中显得十分特立独行，是极其鲜明的文化分区标识。

一、背山面海的地理环境

闽南是指泉州、漳州、厦门三市以及龙岩市的新罗区、漳平市和三明市的大田、尤溪的部分地区，历史上还曾经包括莆田、仙游地区。潮州、汕头先属福建，后归广东，语言和习俗一直与闽南相近，广东人的福佬民系就源自闽南人。闽南人下南洋、过台湾，在海南岛、雷州半岛、温州、福鼎等地至今还分布着闽南方言话的方言岛。据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统计，闽南方言人群约7000万人。

福建是一个东临大海，北、西、南三面陆上边界由分水岭划定的综合自然区省份，一直是稳定而独立的地理和行政区域。水系也是自成系统，除汀江外的主要江河都发源于本省，在本省入海。武夷山脉是东南各省中海拔最高的分水岭，阻滞了秋末冬初来自西北方的冷气流。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对闽文化的形成和演变有重要影响。福建及海峡对面的台湾居于亚欧大陆板块东南角，向北面对浙江和东海，向西面对广东和南海，山地丘陵占全省陆地总面积近95%。武夷山脉自北向西南接南岭绵延约550千米，其走向与东海岸平行，形成福建的西线阻隔和空间界限。从浙江延伸而来的浙闽丘陵山带占据了福建的腹地，衔接南面广东南岭山系南侧两广丘陵，形成第二条南北山系，由鹫峰、戴云山和博平岭等山脉形成，被福建最大的两条江闽江和九龙江截为三段，两条大山带中间是很窄的河谷地带，横剖面呈马鞍形。九龙江流经戴云山与博平岭之间的缺口向东入海，九龙江、晋江下游沿海的冲积平原为闽南地区的漳州平原和泉州平原。漳州平原是福建省面积最大的平原，面积约560平方千米。

福建降雨充沛，重峦叠嶂、山岭纵横，水流汇入河谷形成密布的河网。众多河流源自闽西、闽中两列大山带，干流多垂直于山脉走向，支流多平行于山脉走向；河流有行程短、坡度大、水流急的特征。河流中上游水系多呈扇状，汇流速度快，上游山区雨量和降水强度大，加大了下游洪峰流量。

在某种意义上，东海岸并不完全是福建东侧的空间界限，在海峡另一侧的台湾岛的平原地带位于岛的西侧，台湾山脉海拔都在3000米以上，高于武夷山脉，其空间界限与屏障作用更为显著。

福建东列山带众多垂直海岸走向的支脉与同向河谷平行相间排列，由于1万多年前那次大海岸带下沉，河流下游冲积平原被海水淹没，宽阔的沿海平原成为台湾海峡，只剩下被山丘阻隔的海湾内盆地状分布的沿海平原，和由于海浸而造成面向东南的湾口。海湾深入陆



地而且腹大口小，半岛则在合抱海湾的尾端没入海面，局部丘顶出露海面成为岛礁，造成多海湾、多半岛的曲折岸线和多岩岸、多浅滩、多岛礁的海岸，曲折率1:6.28，国内居首。

二、交通窘境与海上机遇

闽地三面被山岭阻隔，与邻省的陆上联络困难，形成早期的封闭状态。秦汉以前几乎没有道路建设，无论境内或是联通境外的交通，只能利用山脉的隘口和山谷的小径徒步行走，很难通车。当地人也很少养马，货运全靠背负肩挑。福建的河流水网分布在山峦丘陵之中，穿越狭谷，河道坡降大，水流湍急，能通舟楫的水域不多；且主要水系几乎都发源于本省、在省内入海，与外部的水路直接联系也无法形成。江河干流大多与海岸垂直，沿海平原之间的联系道路在架桥技术成熟之前也并不通畅，在洛阳桥建成之前，闽南去往闽东的陆地交通往往还要绕行山路。

海岸线和河流网络，为水运提供了良好条件，福建省内的水上交通有悠久历史。闽人使用舟筏的历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春秋末期，善长驾舟行筏和水战的越人入闽，与七闽土著融合形成闽越族，强化了闽地水运的地域优势。闽越人以舟楫为车马，甚至以船为家，由刳木为舟逐渐开始制造木板船。

三国至南北朝，不断有中原人从陆路和海路入闽，闽江、晋江流域的经济随水运的开发而兴旺起来，造船业和造船技术趋于领先地位。隋唐时期，九龙江等流域河运相继开发，逐步形成福建地区的水运网络；到宋元时期，就已形成从福州“南出莆田，北抵永嘉，西达延

平”的水驿网络。福建古代经济发展区域分布呈现“7”字图形，闽江入海口是转折，闽江流域是前半段。九龙江、晋江的水运之便孕育了闽南两个古代重要的港口城市漳州、泉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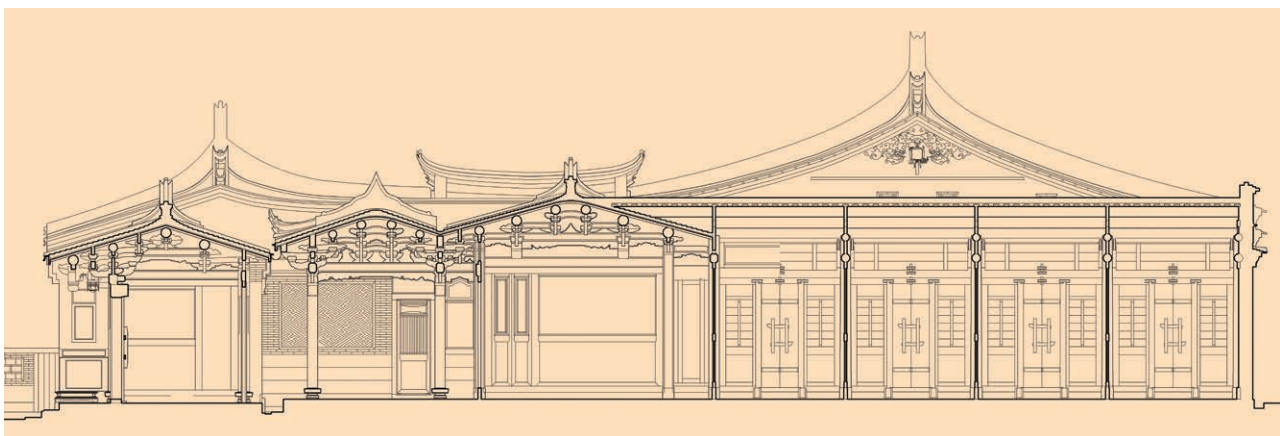
中国东海和南海的大部分海岸线大都凸凹曲折，与相邻的粤、浙两省相比，福建海岸更为散碎，港湾密集，不乏与河流入海口相连的海湾，依托城镇形成通商港口。湄州湾、泉州湾、厦门港、东山湾都是闽南得天独厚、自然航道优良的港湾。

闽越人很早就开始造船和航海。两千多年前闽越王郢在与强大的西汉朝军队对垒时，虽无胜算，但认为只要入海便可全身而退，足见当时闽越人的航海技艺和造船业水平足以支撑大规模海上运输和军事行动。在闽越人航海活动促进了海外交通的发展，在公元前2世纪，闽越人就在东海和南海建立起海上贸易，东汉在开辟广州港之前，东冶港（今福州）作为东南海运和对外贸易的枢纽港口已存在多年，不仅有与夷洲（台湾）等岛屿的航线，还与中南半岛交往频繁，进而开辟了与日本、澶洲（菲律宾）的跨海航线。

三国时期，侯官（今福州）置造船机构“典船都尉”建造海船，设“温麻船屯”建立大规模造船基地。东晋至五代福州港一直是海上交通枢纽，南朝时期泉州地区又开辟了对外港口，有大舶通往印度。唐代，闽南沿海对外海上交通线路和连通的地区迅速增加，航海业和海外交往的繁盛带给泉州等地新的经济结构，改变了社会生活和文化形态。北宋朝廷在泉州设立了第四个市舶司经营海上对外贸易，刺桐港迅速崛起，进阶为国际海上贸易的枢纽港。宋元时期在东南沿海兴起的航海业，使原本耕地匮乏而又人口激增的闽人找到了自己的生存轨迹。依仗天然良港、导航技术的重大突破和造船业的强

● 泉州开元寺大殿





● 泉州杨阿苗古民居测绘图

盛，以泉州为代表福建沿海诸港取得了海上交通的统治地位。据旅行家汪大渊《岛夷志略》所载，其两次从泉州入海航行，亲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就有九十多个。

明代，泉州等地的海上贸易由于元末动乱和明朝数次海禁而消沉下去，闽人的海上优势更多地体现在海上走私、海外移民和扩张海盗势力上。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在宋元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无论是船的体量、装备还是科技含量上，福船都是舰船制造的标杆，无论是郑和下西洋还是郑氏父子的海上霸业，明清重大的航海活动都离不开福船福港。

三、宗教、信仰之源流

福建早期闽越信仰大致为三个系统：种族（如蛇、蛙图腾崇拜），氏族（如太姥、武夷君）和部族（如无诸、部、余善等闽越诸王）。依种族—氏族—部族顺序随着时间进程渐次出现，而其在后世的影响力，却是由部族—氏族—种族顺序淡化。最原始的蛇图腾等闽越种族崇拜在漫长的历史中并未消失，时而透显，考古发现历史遗迹以及文献记载中常出现它们的痕迹。

三国至唐中期，北方民间信仰随北方人南迁传入福建，随之而来的是对山川水火、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以及天地自然的崇拜，用于祭祀的各种坛庙也得以移植兴建。已发掘三国、魏晋南北朝墓葬中出土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和莲花图案的墓砖和瓷器，表明北方关于动、植物崇拜的习俗也被带入闽地。

唐末五代开始，移民逐渐占据主导的福建已经远离了蛇蛮之种、化外之地的原始迹象，闽王虽由中原迁入，却被推崇为“八闽人主”，先前闽越诸王信仰空间被闽国诸王信仰所占据。更早形成的太姥、武夷君信仰的影响范围更为狭小，闽越信仰中具有长期而深远影响的种族信仰是蛇图腾。宋代，闽地民间信仰祠庙绝大多数分布在各时期移民进入的与邻省交汇地带，以及闽江

流域和晋江、九龙江、木兰溪流域的沿海地区。

福建宗教信仰之盛还源于面对海洋的自然地理条件，与海洋和航运密切相关的信仰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妈祖信仰，源于福建，远播海内外，成为最能体现东方精神的中国民间信仰之一。

海上交通促进港口城市与海外商业和文化交流的同时，也接纳了多种宗教进入闽南。泉州作为东方大港，具有很高的国际化程度，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犹太教等宗教跟随侨民落户泉州，多元信仰和睦相处。

西晋时期佛教寺院在闽地分布的记载，反映了佛教入闽与同时代移民轨迹的高度关联。中唐以后佛教兴盛，成为南禅中心之一，百丈怀海、黄檗希运、曹山本寂、雪峰义存、汾山灵祐等唐代开宗立派的禅师都为福建人氏。五代及宋时期，沿海和闽江流域分布了成百上千的寺院。元明清时期，佛教在福建一直延续平稳发展的状态。

福建道教的发端和影响首先集中于闽北武夷山、太姥山和霍童山之间的地区，其次是闽南晋江流域。道教与太姥、武夷君信仰相遇后趋于合流，互为注解。建于晋太康年间的晋江玄妙观为福建最早道教建筑。

四、移民、民系与方言区

大约4000年前，福建全省已遍布“大分散，小聚落”的原始族群，并且逐步由居无定所的游猎采集生活走向定居的以原始农业为主、采集捕捞为辅的生活。夏、商、周时期已存在古老的民族“闽族”，支系部族并立，连同浙江南端部分地区被称为“七闽”之地。闽人不断迁徙、拓荒，逐步在福建各地建起众多的聚落，



① 闽南古建筑木构架
② 水车堵墙面装饰

并且进入毗邻的浙南、赣东北、粤东地区。

战国末期，越南南迁与原住民人合为闽越族，建立以越人为主导的闽越国。秦代设立“闽中郡”，但并未实施管理。汉初复立闽越国，后又遭汉武帝灭国，大约10万闽越人被迁往江淮地区，余者隐匿山林。留守汉军和陆续到来的派遣军人对闽实施管理，亦有少量流亡人口入闽定居，但闽地人口稀疏，经济凋敝状态持续了近三百年。三国时期的吴政权注重开发经营福建，带动大批中原人口迁入闽地，在闽江流域及沿海地区首先形成多个移民聚居区。西晋末年的战乱开始了此后的数次北方人入闽浪潮，迁徙来的北方豪族门阀带领家族、乡里、门客和部属，一族南迁，动辄千人。如此大规模家族集团来到闽南地广人稀之地，与原住民相比，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都有很大优势。不但可以留存自己的语言、习俗和族群结构，还把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和社会文化带入闽南，并逐渐与晋江流域的原住民融合。

唐初，在泉、潮之间置漳州，军队及家眷在闽南就地垦耕、开辟村落、繁衍生息，形成九龙江流域最初

的主体群落。更大的军事移民则是在唐末，王潮、王审知进军福建引发中原人口入闽浪潮。王氏从泉州开始，之后北上统治福建全境，建立闽国。随王氏入闽的不仅有军队及家族成员，裹挟而来的包括政客、文人、僧侣、官宦、商贾以及流卒、贫民等各个阶层。

宋代，政权重心一再向东南迁移，北方人向福建迁徙已成为一种常态。两宋之交及宋末元初的战争移民，使福建人口急剧增长，从唐代41万增至南宋的289万再至元代的306万。这一时期闽南地区的海上贸易繁盛，泉州逐渐走向国际化，大批海外各国的“蕃客”“移居泉州等地，出现很多“蕃坊”“蕃人巷”“蕃学”“蕃文”“蕃俗”传入闽南沿海地区。“蕃客”与本地人通婚，“夷夏杂处”是宋元闽南移民社会的独特现象。

明清时期的屡次海禁大大折减了闽人的谋生机会，福建出现了反向移民的趋势，不仅向赣、浙、粤丘陵山区移民，还向周边诸岛及东南亚、日本本岛移民。

福建历史是和移民史相伴相生的，现代分子人类学发现，闽南泉州群体几乎与河南安阳群体重合，在浙江、上海的汉族群体中反而包含大量百越成分。

汉武帝之前，实行的还是类似羁縻制的以闽治闽的政策，闽人延续着断发纹身、鬼神巫术和崇蛇图腾文化。西汉至隋唐，虽不断有移民潮注入，但定居和生计的困扰使闽地整体的经济和社会文化进步缓慢。直到五代闽王时代之后才出现快速发展的机遇。政治经济重心南移也使福建这块人口洼地逐渐被填平，社会经济进步带来文化兴盛，与之相配的文化教育机构、设施成为从城市到乡村各层级人居聚落中重要的文化景观。福建也从原来的文化荒野变为人杰地灵之地，最具代表性的是朱子理学（闽学）的崛起，在朱熹确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后的700多年一直被奉为儒家思想的正统，受到国家层面的推崇和采纳，影响远至海外。

关于民系的研究表明，民系分布区的分界与语言区界线基本重合。人居聚落的形成和形态与民系内部的社会结构、文化认同以及语言交流等因素密切相关。在以宗族和信奉为纽带的民系枝干上，独特的方言甚至可以成为生产积累、社会生活和文脉传承中的一种密码。不管是商帮还是匠帮，操同一种方言是必备的入门条件，甚至有排他性，无障碍语言沟通维系了一个功能群体内结构机制的相对高效，不同民系的聚落也呈现出明显差异性。福建的很多地方，一座山就可以限制语言习惯互通，进而限制文化和生产技艺的交流和传播，也使不同方言区的人居聚落在选址、布局、



● 烟炙砖墙面

营造和风格取向上的不同走向而呈现出形态各异的文化景观风貌。

福建省内民系根据迁徙时间、地区和分布的不同分为闽东支系、闽南支系、莆仙支系、闽北支系和闽中支系，对应方言为闽语的五大方言分支。经历了多次外来移民和闽地内的再移民，在福建若干个地域分别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居民文化认同群体，有各自独特的方言。

从宋代开始，移民带来的诸多地区方言在福建各地交汇整合，宋元时期形成四个主要方言区：闽北方言、闽东方言、覆盖潮汕地区的闽南方言和闽粤赣交界区域的汀州客家方言。清初演变固化为八个方言区：闽东方言区、闽北方言区、闽南方言区、闽中方言区、闽客方言区、客家福佬双方言带、闽赣方言区和莆仙方言区，此后基本格局再无变化。

闽南支系分布于泉州、漳州两个平原及周边地区；三国时期开始至两晋之交、唐初和五代有数次成规模的移民，从初期的海上路线到后来的武夷山关隘路线，至五代闽南支系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而闽南人分布区的形成则经历了多次变动跨越了很长历史时期，最迟的地区到明清才稳定下来。

福建人挑战地理环境，义无反顾向海洋发展的精神在闽南人身上体现的最为显著。闽南人为追求财富甘冒风涛之险，勇于向未知领域探寻，带有显著的海洋人文精神。至宋元时期，泉州终成海上贸易中心，东方第一大海港。即便是在明清之交，东南沿海屡遭海禁带来

的沿海大萧条，西方殖民者进入南海、控制海上贸易，但是以泉州郑芝龙父子为首的海商集团仍有强大的实力掌握海上主导权。

五、建筑营造技艺的形成

对于红色建筑基调的接纳，并非黏土砖烧制的技术原因，而是闽南人与海洋文化碰撞的结果。宋元时期，泉州是“蕃客”文化最盛行的地区；大航海时代之后西方文化渗入南洋等地是众多闽南人的侨居之所；闽南人常年随船远航，足迹远至北非。这些阅历使闽南人不断从阿拉伯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有所汲取，从而给予了闽南人别样的美学观。闽南人积极的生存态度和开拓精神也对建筑风格的形成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形制严谨一些的民居在闽南被称为“皇宫起”，如果是灰白基调的宅院则不可能有此称谓的。中国传统建筑中闽南的屋脊尾端上冲幅度是最大的，闽南匠师不惜增加一层屋面木构竖起脊尾形成对天指向。

受南宋理学影响形成的风水理气宗盛行于浙闽地区，闽南人注重空间环境中“气”的运行带给人的影响，无论是“南来”或是“东来”，“紫气”却是民居中必不可少的。所以院落正门多朝南或朝东，并以门前宽阔的“前埕”迎之、深广的“后宅”受之。闽南大厝南北纵向背阴面阳，东西横向阴阳等值相济，坐北朝南、东西对称。“气聚而止”也是闽南营造活动中追求的境界，在建筑的细节上做许多刻意的处理。主轴线上门口内凹，



② 厦门青礁慈济宫屋脊装饰



● 泉州蔡氏古民居建筑群修缮现场

为“气”口，接“南来紫气”；墙面上门大窗小，使所含之“气”不轻易散去。院落中央天井的四周屋顶和两侧护厝窄小天井的屋顶均微曲而向内坡，同为“藏风聚气”。建筑组群各个功能空间的门户交错而置，入大出小，有同样的意义。

闽南传统聚落的建筑组群形象带有舢舨景象的印记，源自对舟船的仿生像物的营造方式。福船曾经是中国古代最先进的海船，其首尾上翘的典型形象影响了大众审美，引起了闽南人在建筑上的响应。

“出砖入石”是闽南红砖建筑独特的砌墙方式。明末清初的地震灾害和社会动荡使得资源匮乏，建筑营造最大限度地利用乡土材料和建筑废弃物。“出砖入石”和“城市瓦砾土”砌筑方式催生了一种闽南特有的建筑装饰手法。

闽南大厝源自中原土族文化宅院模式，在闽南依风俗民情和地理环境发生了适应性变异。秉承中原正统对称、规整、严谨和内向的形制，体现主次尊卑、崇尚礼节的儒家传统和等级观念。主厝是主人居所，护厝是佣人仆从房间，上落东大房归长子，西大房归次子。

闽南传统营造技艺分为大木作、小木作、瓦作、砖石作、油漆作、彩画、堆剪作等工种，工匠按工种分类，以大木作工匠为核心。闽南大木作木构架保持了南方木构建筑的基本形式，局部又有本地的特殊做法。屋架在闽南称为“栋梁”或“栋路”，木构架的结构形式是一种称之为“坐梁式栋梁”的木构架，梁架节点受力形式与穿斗式相似，空间形式与抬梁式相似，在南方浙、闽、粤等地很常见。

闽南传统民居的建筑装饰题材和工艺极其丰富，多为吉祥文字与图案。包括了石雕、砖刻、砖拼（嵌）、

木雕、泥塑、彩绘、剪瓷、交趾陶多种技法，装饰部位遍及建筑不同部位。屋面铺设红色筒瓦，檐口有“花头”，瓦陇下有“垂珠”；正门石匾镌刻厝主的姓氏郡望；门联多为厝主的名字冠头联；外墙下端台基砌浮雕螭虎白石；裙墙以上用红砖拼花组成万字堵、古钱花堵等图案。身堵以上水车堵装饰泥塑彩绘或彩陶；山墙多为“出砖入石”砌筑。内墙木板壁按格扇方式分格，身堵木雕彩画，用柳条枳、马鼻枳、斜格枳等形式窗枳卡榫斗拼成各式图案文字；腰堵、顶堵多浮雕花鸟人物。装饰繁复，工艺奇巧精美，反映了闽南石雕、制陶等工艺的高水准以及海外和邻域文化影响的踪迹。

结语

总体上看，唐宋是闽南地区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期，历经元代海上贸易带来的区域繁荣，明清海禁和社会动荡引发的萧条，形成地域个性极强的文化生态和聚落景观。地处山脉阻隔，路无畅达，田地稀疏的边陲，承袭闽越族驭舟漂泊的秉性，使闽人做出了向海发展的选择。虽然不能用海洋文明来定义闽南的成色，但是闽南却是中国与海洋文明交互频次最高、认同感最强的地方，呈现给世人的文化风貌如同闽南人的航路一样去向悠远。参透这当中的地理交通、历史变局和文化融入的因果，是研究闽南文化生态群落的要素、结构和演变规律的基本环节。

（责任编辑 李鹏）

参考文献

- [1] 卢美松主编：《福建省历史地图集》，福州：福建省地图出版社，2004年。
- [2] 刘锡涛：《福建历史地理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
- [3] 林国平、邱季瑞主编：《福建移民史》，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年。
- [4] 林拓：《唐代以前福建宗教信仰的地域分布格局》，《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卷1辑。
- [5] 林汀水：《福建古代陆路交通干线的开辟与变化》，《历史地理》，第二十一辑。
- [6] 林开明主编：《福建航运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
- [7] 席龙飞：《宋元时期泉州的造船与航海》，“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二）。
- [8] 王冠倬编著：《中国古船图谱》，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
- [9] 戴志坚：《闽海民系民居》，广东：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20年。
- [10] 杨莽华、马全宝、姚洪峰：《闽南民居传统营造技艺》，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
- [11] 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